

云南六掌望

◎黃毅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云南六十年望

◎ 黄毅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南文学瞭望/ 黄毅著. -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9.12

(云南作家丛书.第3辑)

ISBN 978-7-5367-4607-7

I . 西… II . 黄… III . 当代文学—文学评论—西南地区—
文集 IV . 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44179 号

责任编辑	张一龙
装帧设计	傅韶辉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邮编:650032) http://www.ynbook.com ynbook@vip.163.com
印 制	云南民族印刷厂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7.5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
印 数	000 1~1000 册
定 价	定价:28.00 元
书 号	ISBN 978-7-5367-4607-7/I·899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联系

序

过 伟

黄毅是一位勤于探索的少数民族学者，由广西师范学院的本科生，而暨南大学的硕士生、云南大学的博士生，由梧州师专的讲师，而昆明学院的副教授，收在《西南文学瞭望》里的三十一篇论文，实证了黄毅一步一步坚实的脚印。

集子里《地域、民俗与环境——论韦编联小说的“民族环境”描写》是1989年就读大学本科三年级时参加“广西民族文学讨论会”的论文，是黄毅学术道路上起步的第一篇论文，评介壮族小说家韦编联小说集《七彩人生》，“注重描绘一个具有浓厚民族气息的生活环境”，“注重描绘一个立体的民族环境”，“注意塑造一个有时代特色的环境”。得到广西社会科学院丘振声研究员的赞赏，收入他主编的会议论文集《花山文学漫笔》（广西民族出版社1990年2月）。黄毅可与他的导师壮族诗人韦其麟武汉大学二年级发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名篇叙事长诗《百鸟衣》媲美，都是青春年华时所作。也可与他的学长壮族学者黄桂秋广西师院二年级发表《读韦其麟凤凰歌》、四年级发表《论壮族排歌“排”的艺术》媲美，都是青年大学生所作。《市场、文学和〈少女梦〉》是执教梧州师专任讲师时，2001年参加“贵州少数民族长篇小说创作研讨会”的论文，评介侗族作家谭良洲的长篇小说《少女梦》，“是一部有市场意识的作品，它叙述的是一个偏远地区的侗族少女焯香一方面反抗、躲避包办婚姻，一方面寻求外出打工以发展的故事。”“这部作品也颇兼顾了我国读者的审美心理。这首先表现在作品人物个性鲜明确定上。……表现在对情节的处理上。……注重以生动曲折的情节来吸引读者。”“这部作品在一些方面也具有较高的文化阐释价值，如民族学、民俗学方面的价值。……赋予人物以有地方的、民族的特点的思维方式的思维，并在此基础上演绎情节……”得到贵州少数民族作家伍略、彝族作家苏晓星、侗族作家袁仁琮、谭良洲的好评，因此与袁、谭二位结下忘年交，写了多篇评论袁仁琮、谭良洲的论文，与土家族作家胡长斌结下了神交，写了多篇评论胡长斌的论文。《守望和谐——论袁仁琮小说的价值取向》评论袁仁琮《山里人》、《王阳明》、《血雨》“价值取向上也注意与国家社会保持一致，服务

于时代政治，时代痕迹明显”。《穷乡》、《难得头顶一片天》、《梦城》“较多地体现了他自己对社会的独立思考，在价值取向上变得独立，并以关注社会问题，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有益于社会，致力于社会和谐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山原的独行者——读中篇小说集〈大梦谁先觉〉》评论“主题是批判的，但写得很真诚”。“一类是批评时弊的，它包括《你不可以拒绝》、《大梦先谁先觉》和《张大嘴巴等待》三个作品；另一类则是重批判人性的弱点的，也包括《地狱与天堂》、《山原传奇》和《六月流火》等三个作品”。“这些作品的表现方法是西方现代主义的，而且运用得纯熟，还取得了较好的艺术效果”。黄毅的研究可分为两方面的类型。以上诸篇，都是对具体作品的具体分析，这是第一方面的类型。另一方面，后面再谈，再论。

云南是多民族共居的地域。

云南文学界是多民族文学百花争艳的大花园。

云南文学评论界是关注少数民族文学的学者群体。我在云南文学家、文学评论界有许多朋友：晓雪、傅光宇、杨知勇、李缵绪、张福三、昂自明、李期博、祝华生、杨照辉、张信、王明达、盖兴之、张定明、岩峰、王松、杨忠德、晨宏、宇飞、家铭、马文彪、王敬骝等。在贵州、四川、重庆也有不少朋友，广西的朋友更多。

黄毅作为一个壮族人，在云南这样的学术环境里，视野发展得更广阔，钻研发展得更精深。他以云南、贵州、广西以及湖南（苗族先民大诗人屈原，现代苗族大作家凤凰人沈从文）为深耕的地域。他从事古今作家文学和民间经典的探索，如清代壮族诗人韦绣孟的诗集《茹芝山房吟草》，壮族张鹏展、黄体正、郑献甫、韦丰华、韦绣孟、曾鸿燊、陶天德的文人文论，壮族歌谣经典《欢桺》，毛南族歌谣经典《毛南族民歌》，广西民间故事经典《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广西卷》，瑶族民间爱情故事经典《吉冬诺》、《五彩带》等。《欢桺——走近古代壮族社会的理想之舟》评论《欢桺》是“一部比较深入细致地反映了古代壮族社会生活、心理、思想及各种观念的难得的古代典籍”。“古代壮族社会生活的生动反映”，“恋爱生活有较全面的反映”，“较突出地反映婚姻生活”，“较详细地描写了劳动生活”，“可以大致了解经济生活”，“对军旅生活有一定反映”。“古代壮族心灵世界的窗口”。《了解毛南文化理想窗口》评《毛南族民歌》“汇集了毛南族人民丰富的思想文化观念”，“反映了毛南族的历史”，“体现了毛南族民歌达到的艺术水准”。《原始思维与民间故事的审美》着重探索《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广西卷》的神话部分的原始思维。“神话出现了许多神奇的形象”，“神话出现了万物有灵，人与物的互相转化，灵魂不死等神奇的情

形”，“原始神话产生了许多神奇有趣的情形”，“具有了神奇性”。以上也都是对具体作品或作品集的具体分析，也是第一方面的类型。

第二方面的类型是引用诸家之论，最后表达黄毅自己的见解。《茅盾文学奖与文学的生产机制刍议》，先引茅盾1981年3月14日的临终遗愿：“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我将我的稿费二十五万元捐献给作协，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什么是“最优秀的长篇小说”？刘白羽认为，“不能照顾题材，也不考虑其它因素，而要全凭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平评奖”。朱晖认为“几乎在每一时期，所谓政治的质量认证，标准的制定和运用，总是一目了然的，往往也是公之于众的且不折不扣地执行的；而所谓的艺术的和审美的认证，则不幸总是居于从属的和附加的地位；标准，……往往只能是任由可以‘说了算’的那一部分人‘见仁见智’地制定和执行……”洪治纲认为“这里的‘最优秀’毫无疑问是针对艺术性而言的”。张恒学认为“作为文学奖，首先评的是‘文学’，即对象的艺术属性和艺术品质、艺术成就，这其中就包容了作者的‘情感价值’，即思想性”。黄毅分析茅盾文学奖评奖标准和评奖办法之争，反映了这样一些事实：好作品的遴选中存在三种话语权力主体。“好作品是高度的思想性与高度的艺术性的统一”，“以作品的艺术性的高低作为作品高下的惟一标准”，“作品要能表达百姓的心声，还要有可读性”。“三种意见体现了各个话语权力主体对文学的理解和要求。”评奖由中国作家协会组建的评奖委员会和决定的评奖办法来评。作为一个地方师范学院的副教授当然可以发表发表意见，也只是发表发表见解而已。他的见解——大奖对作品的遴选与经典作品的遴选相似。经典作品怎样遴选出来的呢？就是国家、精英、民间三种话语权力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国家话语权力通过出版、表彰奖励、资助其拍摄影视作品、直接评论；精英话语权力通过文学评点、文学批评、评论、进入文学史；民间话语权力就是阅读、作品的销售量。茅盾文学奖的评奖办法要体现客观的经典文学作品产生的这种遴选机制，减少茅盾文学奖的矛盾。黄毅勇于发表见解值得嘉许。《论文论史长期否定〈离骚〉表现方法的原因》引汉淮南王刘安和司马迁全面肯定屈原及《离骚》，班固否定《离骚》，指责屈原不该“数责怀王，怨恶椒兰”，“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王逸肯定《离骚》，认为“《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刘勰说“至于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诡异之辞也。”朱熹认为“原之为书，其辞旨虽或流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己之至意。”“至于语冥婚而越礼，摅怨愤而失中，则又风雅之再变矣！”刘勰、朱熹“用儒家的重实践的理性观念，去反对文学中的艺术表现的特点，企图以生活的真实

去否定艺术真实，‘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观点在他们的文艺批评中，起了主导作用。他们不了解神话是原始人类同困难和自然斗争的产物，不知道神话反映了原始人类的感情、愿望和理想，充满浪漫主义精神。而屈原运用它，也是为了表现自己在现实斗争中的愤怒之情和不能实现的崇高理想。”黄毅引古今诸家见解，表达自己的见解——否定《离骚》者是站在“理性的、逻辑的思维的立场上，对《离骚》中的原始思维进行否定。”他梳理《离骚》与原始思维有以下四点：人物形象奇特非凡，人物形象蕴含很强烈的感情色彩，多超现实的神灵，多用象征。

总之，《西南文学瞭望》“云南文学瞭望”评介白族张长、项兆斌、尹相如、夏天敏四位云南作家。“贵州文学瞭望”评介彝族苏晓星，侗族袁仁琮、谭良洲，土家族胡长斌四位贵州少数民族作家。“广西文学瞭望”评介清代壮族韦绣孟、张鹏展、黄体正、郑献甫、韦丰华、韦绣孟、曾鸿燊、陶天德，民歌，瑶族《吉冬诺》、《五彩带》，《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广西卷》等九位作家、多部民间文学经典。“瞭望的新视角——可能与实践”探索茅盾文学奖与文学的生产机制，红色经典《林海雪原》中的精英话语和民间话语，《琵琶记》缘何衰落，《离骚》与原始思维，沈从文的经典重造焦虑及成因，近十年我国文学的原始思维研究综述。对西南文学的研究，作出了尽心尽意的探索，是一部值得推荐的好书。

谨为序。

2009年12月9日

[作者简介] 过伟（1928—），江苏无锡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民间文化遗产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戏剧家、民间文艺家三协会及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二、三、四届理事。中国民俗学会一、二、三届理事，四届荣誉理事。广西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广西民俗学会名誉主席。出版《中国女神》、《草根文学，快乐写作——过伟民间文学新论集》等67部。中国文联、中国民协“第八届山花奖·民间文艺成就奖”获奖者。中国作家协会“从事文学创作60年证章证书”获得者。

目 录

序 过伟 (1)

云南文学瞭望

主流审美趣味与张长小说的审美抉择	(3)
物欲横流中的生存思考——读项兆斌《罪圈》	(10)
美似梦，梦般美——读尹相如散文集《林中夕照》	(19)
惨痛的现实，巧妙的构思——评夏天敏的《好大一对羊》	
.....	(28)

贵州文学瞭望

走向多元的贵州民族文学长篇小说创作

——从三部长篇看贵州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走向	(33)
守望和谐——论袁仁琮小说的价值取向	(40)
言说者，代言人，评判者——从《梦城》看少数民族作家	
民族情感到民族特色的实现方式	(46)
袁仁琮《穷乡》与《难得头顶一片天》的美学追求	(52)

“干预生活”文学的新变

——读袁仁琮的长篇小说《太阳底下》	(57)
市场、文学和《少女梦》	(61)
通俗，承载着厚重之思	

——评贵州侗族作家谭良洲的长篇小说创作	(67)
---------------------------	------

侗族发展进步的诗化关注与思索

——评《月色清明的夜晚》	(74)
--------------------	------

面向文学瞭望

山原的独行者——读中篇小说集《大梦谁先觉》	(80)
胡长斌先生小说创作再论——兼评《雄风满山》	(88)
论《之巅》的山原特色	(93)
 广西文学瞭望	
文化适应与传统壮族文人诗歌创作的走向	
——以韦绣孟为例	(103)
地域、民俗与环境——论韦编联小说的民族环境描写	(110)
传统的诗人，传统的诗——论《竹庐诗存》	(118)
传统壮族文人文论的价值和意义	(123)
《吉冬诺》与瑶族文化	(132)
影响瑶族民间爱情故事审美的因素初探	(142)
《欢棹》——走近古代壮族社会的理想之舟	(149)
了解毛南文化的理念窗口——评《毛南族民歌》	(154)
用平常的百姓故事，彰显广西的历史文化精神	
——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广西卷》	(162)
 瞭望的新视角	
茅盾文学奖与文学的生产机制刍议	(171)
红色经典经典化中的精英话语和民间话语	
——以《林海雪原》为例	(178)
《琵琶记》，经典缘何衰落	(186)
论文论史长期否定《离骚》表现方法的原因	(195)
《离骚》与原始思维	(205)
沈从文的“经典重造”焦虑及成因	(213)
近十年我国文学的原始思维研究综述	(221)
后记	(228)

云南文学瞭望

主流审美趣味与张长小说的审美抉择

白族作家张长的小说的审美趣味是值得关注的，这是因为，张长小说的审美趣味既是少数民族的，同时又是主流读者的。张长小说审美趣味的这一双重性特点，或许正是他的小说能得到主流读者群广泛认同的一个重要原因。

张长小说的少数民族审美趣味主要表现为，在他的小说中，有一种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热爱。这种热爱首先表现为他热爱少数民族的人民。由于少数民族生活的地区大多都比较封闭落后，生产生活因而与内地有较大的差异，表现在人的性格上，少数民族人民往往就显得比较淳朴。对于这样的淳朴性格，张长的小说给予了赞美与热爱。如《空谷兰》中的兰芮，就是一个有着淳朴性格的傈僳姑娘，作家赋予了她许多美好的品格——她不仅美丽，还勤劳：她领着学生上山伐木，割茅草盖房子，一个人办起了学校。她从不缺课，每天放学后还像其他傈僳妇女一样，背水、喂猪、找柴火。善良：她用星期天为学生架桥；她用嘴为被毒蛇咬伤的学生吸毒。聪明：“工作中，我觉得兰芮相当聪明，教她的东西一学就会。她很快学会了看州的报纸，学会了简谱。”总之，她是一个和尖刻、自私的上海知青萍萍完全相反的人。张长以极大的热情塑造这样一个少数民族人物形象，赋予了这个形象许多美好的品格，说明他对少数民族人民是有着偏爱的。

在张长的小说中，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如《山的渴望》中的扎莫尽管已经来到了城市，但仍保持着少数民族人民所特有的淳朴——对那些有些人见到后寸步不离、点头哈腰的体委头头们，他连个“主任”都不会叫，一天就什么老张老李的，有时火了还骂娘。好不容易当了个科长，科长的权不用，成天干那些工人干的活，把好端端的一顶乌纱、一把交椅搁置了起来。《水面上有两顶帽子》中的扎妥则在连队里养猪，还常常帮别人擦皮鞋、洗衣服。两人都表现出了少数民族所特有的淳朴。作家爱他们的淳朴，爱他们的无私的奉献精神。在他的小说中，少数民族人民大多是可爱的人。

这种对少数民族人民的热爱，还影响到了他对作品中人物的塑造。在他的

小说中，少数民族题材的与非少数民族题材的，正面人物往往都是那些淳朴、具有奉献精神的人，反面人物则是那些自私自利的人。如《空谷兰》中的居民杰，一个上海知青，有这样的特点；《希望的绿叶》中的倔强的记者汪墀也有这样的特点；《濛濛烟雨》中的宋捷文、《朦胧的永远》中献身边疆的实习医生曾敏更有这样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在塑造这些具有少数民族的淳朴的特点的非少数民族人物时，作家是站在主人翁的立场上来塑造的，对他们始终怀有一种深深的敬意，就如他在《张长小说选》的后记中说的那样：“我从心里崇敬这两个小伙子（即居民杰的原型——本文作者注），并决定要以我所不熟悉的短篇小说的形式讴歌他们，借以寄托我对这里的土地和普通劳动者的爱。”①

二是对少数民族地区生活的热爱。张长的小说，总表现出对少数民族地区生活的热爱。这种热爱，也许源于这样的一种认识：“也许，自然和人、人和人之间都存在着某种生态平衡，说不定正是这种生态平衡才使这边僻的小坝子的人、山水，以至小小的街道，一切都那么和谐和美好。”（《濛濛烟雨》）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张长对少数民族生活的描写，常常是诗情画意的。如在《山的渴望》中，他是这样写少数民族的生活的：“‘枯扎扎’节那天，各村各寨的所有的男女青年都要化装，有的脸上带着面具，有的抹着油彩，有披花毡的，穿长袍的，束红绸的，挂鸡笼的，提棍棒的，戴荆冠花环的……随心所欲，千姿百态，看了就想笑，就想跳。这节日的化装游行队伍打着牛皮鼓，唱着，跳着，每到一寨，姑娘们便应和着牛皮鼓，打上几圈磨秋，跳上一曲鼓舞之后，也被卷入这狂欢的人群，游到更远的寨子。这化装游行的队伍越来越大，越来越热闹。”在《温哥华来的马锅头》中，他这样写少数民族的生活：“他和她——当年一个美丽的哈尼族姑娘——在寨子里巴乌吹响的时候，来到了那个地方。天上残留着一抹晚霞，她的脸，也红得像一朵盛开的马缨花。那个黄昏，她觉得周围像是烧着了野火。火烧着天上的云，火烧着树上的花，火烧着姑娘的脸，火烧着他们俩……一个年轻的马锅头和一个美丽的哈尼姑娘，以一种野性的力在月亮升起的时候，在一株燃烧的马缨花树下干完了那件事。他按照哈尼人的习惯在树上做了个记号，第二天便带上姑娘吆上他的马帮走了。”

虽然对少数民族的生活有着偏爱，但这并不影响作家的理性认识——他也认为，一些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的确需要改变。如在《阿佤的种》和《被撵出部落的人》这样的作品中，对少数民族中的那种原始共产主义，他显然是觉得要加以改变的。还有，在《最后一棵菩提》中，对近年来少数民族中的那种急

① 张长：《张长小说选》，第291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87年11月。

功近利、乱砍滥伐显然也提出了批评。

三是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环境的热爱。张长以少数民族的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常常表现出了对少数民族生活环境的热爱。如《最后一棵菩提》，作家就这样描写少数民族的生活环境：“阳光灿烂。那些被大雾弄湿羽毛和各种鸟儿，这时便要在阳光下飞翔，晒干它们的翅膀。‘呼——’一片绿云遮太阳，那是成百上千只鹦鹉。‘吱——喳！’又一片红云在寨子上空飘来飘去，那又是火红的太阳鸟群。不时，还有拖着沉重的大尾巴的孔雀翩翩飞过，在寨子上空撒下一根脱落的翎毛，孩子们便欢呼着去抢。原鸡更是常常啼叫着‘茶花两朵’，跑到家鸡群里找公鸡寻衅，见到人又才扑哧飞去。半夜，月明星稀，小麂子常大声叫着‘罕——’‘罕——’，走到竹楼下，你还得把竹楼的篾笆拍得山响才能把它轰走。”又如，在《濛濛烟雨》中，作家这样写道：“这是个小小的盆地。远看，整个儿就像抹在画布上的浓浓的油彩，有一种凝重的立体感。不，是水彩！饱含着欲滴的水珠。或者像宣纸上刚刚洇开去的一滩墨绿。最难得的，是一个个如玉笋、玉簪、玉柱、玉屏的兀立的山头，和如绿绸般穿行于这些山涧中的溪水。”毫无疑问，这些散文化的描写写的都是西双版纳的自然景色，傣族的生活环境，张长笔下的这些童话般的生活环境，无疑说明了张长对这些少数民族的生活环境的热爱。不错，他深爱着少数民族生活的自然环境，这种爱，使得他有一种强烈的对这种环境的保护意识，这就直接导致了《希望的绿叶》、《最后一棵菩提》这样的作品的产生。

尽管张长小说的审美趣味有少数民族的特点，但从总体上看，张长小说的审美趣味却是主流的审美趣味的。这种主流的审美趣味主要表现在下面这些方面。

一是张长的小说所关注的始终是我们这个社会中的热点问题。张长曾说：“一个第一流的少数民族作家，不应该是离开了自己的民族和生活基地之后便一筹莫展的人。他应当是一个可驾驭他所熟悉的任何题材的人。”^① 无独有偶，作家阿来也表达了类似的想法，他说：“文学表达的不是差异性而是普遍性。不要仅仅因为喜欢自己的民族就只关注自己的民族，表现民族应该只是自己的一人之口。”“真正的文学应该表达人类共同的普遍的情感，只顾着表达少数民族的差异性可能就是少数民族文学的误区。”^② 读张长的小说，的确感觉到他总在不

^① 冯牧：《勇于探索，稳步前进——〈张长小说选〉序》，载《人民日报》1986年4月28日。

^② 明江：《阿来：民族文学表达的不是差异性》，载《文艺报》2009年4月9日。

不断地探索，他的小说不断地在变——题材在变，主题在变，表现手法也在变。但不难发现，张长小说关注的，始终是主流社会里读者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试看张长这些有代表性的作品：《空谷兰》（1979），《朦胧的永远》（1998），聚焦献身边疆建设发展的人。《希望的绿叶》（1980）、《最后一棵菩提》（1983），关注森林、环境的保护。《皈依者的儿子》（1982），《蓝地毯》（1987），《魔幻》（1986），反思“文革”。《心儿在歌唱》（1983）写得比较理想化，读后让人想起八十年代初的一个著名电影——《莫让年华付水流》。《爱是爱的伙伴》（1984），《无韵的琴声》（1986），《有一个女人叫“酸杏儿”》（1988），《濛濛烟雨》（1985），《永远的门》（1990），关注的是当代生活中的爱情与婚姻问题。《水面上有两顶帽子》（1985）、《被撵出部落的人》（1988）、《山的渴望》（1989）及《阿佤的种》（1989）四个作品，关注边疆少数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求签》（1990），《户口》（1992），关注知识分子问题。《沉落》（1992），《吞下这朵烤焦的玫瑰》（《羊城晚报》2006年8月6日），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人的变化。《苦竹箐》（1994），《双色球》（《中国作家》2009年第二期），关注社会中的腐败问题。等等。这些关注点，在主流读者群中都是被反复言说、耳熟能详的。关注社会中的热点问题，才能得到主流读者的关注，这不仅仅是社会的焦点更能吸引读者的问题，还有一个审美趣味的认同问题。因为，文学中的社会热点已不再仅仅是社会热点，它实际上是时代的审美在文学中的反映。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表明张长小说的审美趣味与主流审美趣味保持着某种一致。

二是在思想的表现及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张长小说的审美趣味是主流的。在思想的表现及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张长的小说也是主流审美趣味的。小说要表现思想，还要塑造人物形象。九十年代以前，正如贵州学者、作家袁仁琮所说，人们喜欢用预先划定的框框去框人物。不是把他们划入这个圈子，就是把他们划入那个圈子。非此即彼。世界观呢？不是唯物论就是唯心论，看问题简单、极端。^① 在这种大环境下，我们发现张长的小说在思想的表现及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都是极单纯的，这在《空谷兰》、《希望的绿叶》、《最后一棵菩提》等作品中都不难看出来。九十年代后，表现复杂的、深入的思想和多面的人物成了主流，由此我们看到，张长小说的思想趋于深刻和复杂，人物形象则趋于多面化。前者可以《双色球》作为代表。在这个作品中，作家触及的是腐败的问题。

^① 过伟：《鲜活的哲学家艺术形象——读侗族作家袁仁琮长篇小说〈王阳明〉漫议》，载《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2001年第3期。

在别的此类作品中，腐败分子往往腐败得坚定、执著，甚至义无反顾。在作品结束时，这些铁杆的腐败分子又都无一幸免地统统被绳之以法。而《双色球》中的腐败分子——某市规划局局长童洋也非常渴望得到钱，但他也怕因此而落马并锒铛入狱。为此，在得到了五百万后他坐卧不安，寝食俱废。一个偶然的机会，家中的钟点工买双色球意外中奖，他也以此漂白了自己的五百万不义之财，这才喜形于色，大宴宾客。故事在童洋得意忘形中结束——他并没有因腐败而遭到任何惩罚。这样，作品不仅把复杂的人性生动地表现了出来，还引发了读者对反腐问题的深入思考，在反映现实的深度上，是引人注目的。而后者——塑造多面的人物形象，则可以《吞下这朵烤焦的玫瑰》为代表。这个作品中的尚珍，读者就很难对她作出好坏的判断。她富有才情：毕业于名牌大学，还是工程师，跳槽到四星级酒店，很快就当了大堂副理，再跳槽到外企，又很快当了外企的老总。她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一次又一次地放弃了在别人看来很不错的工作，一次又一次地换新的工作。她懂得享受生活：她不像那些贪得无厌的女人，有十万想百万，有百万想千万。她觉得钱赚够了就行了，然后去做自己想做的，玩自己想玩的。但也正是这种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懂得享受生活，使得她的个人生活很难让人赞同：在当酒店大堂副理的时候，她结识了一个长得很帅的法国青年，接着就是与他同居，跟他到法国，在科西嘉度过了快乐、甜蜜的一个月。而当这个法国青年提出要和她结婚的时候，她却拒绝了。在一个晚会上，当她见到一个小她一半而又有清纯而热烈的眼神的男孩时，她不禁又产生了想尝一尝的欲望。“一个坏女人。”她自己也这样评价她自己。但又正是这个“坏女人”，当发现这个男孩吸毒时，她立刻声明：“到此为止吧。”“别想再见到我！”说完，“不等回答，她一踩油门，绝尘而去。”这是一个好人？一个坏人？读者恐怕很难用好坏来衡量她。张长在 1992 年曾发表过一个叫《沉落》的作品。这两个作品有某些相似之处，但看得出来，其中的人物已有很大的不同。《沉落》的主角是个为出国不择手段的女性，读者因此不难判断她是一个坏的角色。而在《吞下这朵烤焦的玫瑰》中，主角再也不能这么简单地作出判断了。张长小说的这种变化，显示了张长小说在思想的表现及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与主流审美趣味是一致的。

三是张长小说的表现方法也是主流的审美趣味的。张长主张，写小说的手法越多样越丰富越好。读张长的小说，感觉他的表现手法的确是多样的。一方面，从西方引进，在国内一度流行的表现方法如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等方法，他的作品中都有。《希望的绿叶》用了意识流的方法，谢永旺在 1984 年 8 月 20 日致张长的信中特别予以了肯定：“‘意识流’又有什么可怕？取其所长，为我

所用就是了。《希望的绿叶》用了这种手法，用的较好，强化了主题。”^① 而像《朦胧的永远》、《魔幻》、《永远的门》及《苦竹箐》等作品都明显具有某种神秘感，这样的作品显然是受到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的。这些创作方法都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从西方引进的，在全国文坛上很热闹了一阵，张长的小说也学习了这样的创作方法，看得出他对主流审美趣味的追求。

另一方面，张长似乎也非常注意学习与完善中国传统小说的表现方法。中国传统的小说重视故事情节的生动性与曲折性，这在张长的小说中也有很明显的反映。张长小说的故事一般都不复杂，但他能把故事讲得生动曲折、引人入胜、出人意外。如《求签》这个作品，写一个勤勤恳恳的知识分子老H在一个庙里求得了一支下下签后，心情沉重，疑神疑鬼，以致心理变态，不能自拔。当“我”认定他已经在交通事故中遇难了之后，小说的情节一转——老H没死，他又在“我”家门前出现了。原来他抽了下下签之后，因食宿不安，通宵失眠，第二天在客运总站竟然晕头转向地上错了车，一路上昏昏沉沉，似醒非醒，等到发现时已来不及了，索性将错就错，绕道另一条路回昆明，结果反而躲过了一场大灾难。这个大转折，非常出人意料，使故事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效果。同样，《户口》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作品。母亲去世了，去世前要求对她进行土葬。母亲扶养他成人不容易，他也答应了母亲的请求，悄悄地把母亲土葬了。但麻烦也接踵而至——他无法为母亲消掉户口。他到派出所注销母亲的户口，派出所要火葬场的火化证明，否则不给注销。他到火葬场想让火葬场胡乱出个证明，火葬场却坚持原则，坚决不同意。正不知如何了结的时候，小说情节一转，让几个农民给他出了个主意——把老人的户口转到专县，这样什么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像这样的作品，是非常适合中国主流读者的审美趣味的。

张长是一个在全国有影响的作家，他的第一篇小说作品——短篇小说《空谷兰》获1979年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该奖后纳入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希望的绿叶》获1981年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该奖后改名为骏马奖）；短篇小说《最后一棵菩提》获1985年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长篇小说《太阳树》获1997年第五届骏马奖。到目前为止，除长篇小说《太阳树》外，还出版了小说集《阴差阳错三部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种子和八卦》（中国文联出版社1986年）、《张长小说选》（四川民族出版社1987年）《求签》（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情系大理——张长卷》（民族出版社2003年）等五部。我在采访他的时候，张长曾告诉我，目前他已经出版了十八本书，

① 张长：《求签》，附录第5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1月。